

合作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合作运动研究

Cooperative Movement & The transition of Rural Society

——The Study of R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North China in 1920-30s

刘纪荣◎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得到安徽财经大学

2007年度博士论文出版专项资金资助

2014协同创新中心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合作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合作运动研究

刘纪荣◎著

Cooperative Movement & The transition of Rural Society

——The Study of R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North China in 1920-30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合作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合作运动研究/
刘纪荣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 - 7 - 5161 - 6130 - 2

I. ①合… II. ①刘… III. ①农业经济史—研究—华北地区—20 世纪
②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华北地区—20 世纪 IV. ①F329. 2②C912. 82
③D693. 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980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 鹏

责任校对 卢战伟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75

插 页 2

字 数 382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母亲以及逝去的所有亲人

序

王先明

就历史变革的进程而言，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革始于 20 世纪初年。时至今日，在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乡村社会变迁始终是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中乡村占居绝对的多数，而且因为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从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即使对于整个中国近现代史而言，近代化或城市化进程，本质上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

20 世纪初期开始的中国乡村社会变革虽然在世纪末取得了质的飞跃，但变革的历史进程却仍在继续。“20 世纪之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是从“长时段”探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课题，而且也是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尤其是农村变革、发展道路的重大课题。这是它所独具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之所在。

当“三农问题”构成制约中国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时，对它的关注和寻求解脱之路的现实需求，催促着我们不得不对其进行学理或学术层面的分析。诚如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张荫麟说：“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Genetic Relation）有深浅之不同，至少就我们所知是如此。按照这个标准，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愈深愈重要故今通史家每以详尽略远为旨。”^①因此，由现代回观历史，从历史审视现代，就必然成为现代史学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

毋庸置疑，困扰当代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有着近代以来自身形成、发展和演变的线索，当然，也是近代历史进程中人们所曾着力解决的

① 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自序”，第 6 页。

2 合作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

问题。人们早已认识到，虽然近代农民生存条件和生存状态与传统社会并无质的差别，但是，近代以来的农民生存则也更多地呈现出社会变迁中的具有时代性的特征。因为“我国古时重士农，轻工商，所以农民的地位非常高尚。”但到了近代以后，“工商业一天一天的发达，工商的地位逐渐提高……农民的生活一天一天的变坏，他们的地位一天一天的降低……”^①近代中国农村问题的出现和累积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时代，就在于它不仅受到社会政治变动所引发的权利结构的动荡影响，同时还受到农村阶级结构内在规律引发的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的周期性振荡，而且更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乡村社会生存和发展形成的巨大压力和分解力。立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探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就成为我们历史研究者的责任。

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凸显可以说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历史主题。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既承负着现代化进程也承负着半殖民地化进程的双重困厄，因而乡村社会变迁更多地表现为危机的加剧、交错和寻求解脱危机的基本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问题，必然是超越乡村本身的问题。“我们知道，现代文化虽然并不一定与农村绝缘，但它是附丽于工业发展而进化的。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经济之急度崩溃，必然要发生愚贫弱私的现象，农业建设终究不能解救农民的贫困”。^②因此，在探求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同时也是探求中国现代化出路的讨论中，汇聚的学识和学科范畴也是极其广泛的：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等。这些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范畴都将与历史学的实证方法相结合，构成这项研究的特色之一。

历史学的功用，可以在超越一时的模式，在历史解释的重构——比较和检验中，获取更深层的理性认识。

目前，学术界对此还缺乏深入的、系统的研究。此书的研究成果是研究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经反复修改提高而成，具有学术上的创新性、前沿性和研究主题的系统性、互补性。

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感，当下中国坚持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① 杨开道：《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救的方法》，《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1927年），第36页。

^② 齐植璐：《现阶段中国经济建设论战的批判》，《东方杂志》第32卷第24号（1935年），第39页。

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全面展开，农民专业合作社正蓬勃发展，中国社会变迁尤其是乡村社会变迁愈益深刻而广泛。学术理论研究没有终点站。期待纪荣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不断进步、勇攀高峰。

2008 年 10 月 8 日于南开园

目 录

导言	(1)
第一节 选题的动机与意义	(1)
第二节 学术史的回顾与述评	(8)
一 中外近代乡村社会的宏观研究	(8)
二 中观层面的近代华北乡村区域研究	(9)
三 近代华北农村合作运动研究	(12)
第三节 相关概念的诠释与辨析	(24)
一 合作与合作社	(24)
二 合作组织·合作经济·合作制度	(30)
三 合作运动·合作主义·社会主义	(33)
四 制度变迁·社会变迁·乡村社会变迁	(40)
第四节 方法论的探讨与分析架构	(44)
一 方法论的探讨	(44)
二 本书的框架结构	(45)
第五节 资料搜集与运用	(47)
 第一章 华北农村合作运动的历史背景	(50)
第一节 近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	(51)
一 合作运动在西方	(51)
二 西学东渐与清末民初的合作主义思潮	(54)
三 早期合作运动——知识界的合作社团活动	(64)
第二节 近代中国与华北的乡村社会经济状况	(70)
一 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分析——“三农问题”的历史解读	(71)

2 合作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

二 华北农村“普遍贫穷”的社会生态	(80)
-------------------------	------

第二章 华北农村合作运动的兴起

——华洋义赈会的合作防灾试验	(97)
第一节 华北大旱与华洋义赈会	(97)
一 “民九大旱”——华北农村合作运动的导火索	(98)
二 华洋义赈会——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播种机	(100)
第二节 河北合作防灾试验	(110)
一 组社基本过程	(111)
二 经营管理制度	(114)
三 华洋义赈会的合作教育	(123)
第三节 近代农村合作运动的“一支独秀”	(126)
一 河北合作防灾实验的特点及其成功秘诀	(126)
二 初期华北农村合作运动的障碍或缺陷	(128)
三 华北农村初期合作事业的影响	(131)

第三章 华北农村合作运动的多元化发展

(136)

第一节 多元指导下的华北农村合作运动	(136)
一 南京国民政府的合作政策	(137)
二 地方政府农村合作政策的初步实施	(143)
三 乡村建设团体的合作实验	(149)
四 农贷机关与农村信用合作的发展	(159)
第二节 华北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合作	(170)
一 华北各省农村合作的实施概况	(170)
二 农村合作社的扩展——以华洋义赈会为中心	(173)
三 合作教育——农村合作运动发展的重要保证	(179)
第三节 农村合作社的比较:华北和江南	(181)
一 数量落后	(182)
二 质量领先	(183)
第四节 中央及地方政府合作行政上的主要问题	(186)
一 中央及地方合作行政与促进机关的设立	(186)

二 合作行政上的主要问题	(188)
第四章 华北农村合作运动的空前发展	(198)
第一节 政府对农村合作的规范发展	(198)
一 合作运行机制及其职能划分	(199)
二 合作立法及《合作社法》的颁布	(203)
三 全国合作事业讨论会	(209)
四 全国合作行政的初步统一	(210)
第二节 县政建设实验与农村合作运动	(212)
一 县政建设实验的酝酿与启动	(213)
二 定县农村合作实验——县单位合作制的创立	(215)
三 邹平学制与农村合作	(231)
第三节 华北农村的合作事业	(244)
一 河北省的信用合作事业	(244)
二 山东省的农村信用合作事业	(252)
第四节 华北农村合作运动的总体考察	(256)
一 华北农村合作社的时空分布结构	(256)
二 华北农村合作社的发育特征	(259)
第五章 合作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一)	(266)
第一节 合作组织与地方宗族(家族)	(267)
一 乡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动	(268)
二 对《河北合作》内容的历史考察	(274)
三 贺家营合作社——宗族社的案例分折	(278)
第二节 商资归农的历史考察	(284)
一 商资归农的原因	(285)
二 商资归农的发展过程	(287)
三 商资归农与农村合作的关系	(291)
第三节 合作放款研究	(297)
一 放款手续与放款时期	(297)
二 放款种类与放款金额	(299)

4 合作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

三 放款用途与放款期限	(302)
四 放款利率	(306)

第六章 合作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二)

(309)

第一节 从农村合作到乡村社会改造

(309)

一 促进乡村教育	(311)
二 改良农业生产,增强农民生产力	(315)
三 提倡移风易俗,促进乡村进步	(316)
四 加强公共服务,建立保障机制	(321)

第二节 农村合作医疗的诞生

(326)

一 合作医疗诞生的社会土壤	(327)
二 定县“县单位三级医疗保障实验”	(328)
三 合作医疗的正式“出笼”	(330)

结语 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华北农村合作运动

(333)

一 时代的需要	(335)
二 历史的错失	(337)

参考文献

(339)

后记

(348)

出版后记

(351)

导 言

本书系作者 2006 年南开大学博士毕业论文的最终修订稿。作者选定在“合作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框架下，探讨 20 世纪初期华北农村合作运动发展历程中合作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欲在总结近代华北区域农村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求一条适合于本区域的乡村现代化之路，为 21 世纪的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第一节 选题的动机与意义

本选题可从本人的乡村情结、现有的学术资源以及近代华北区域特殊的社会经济历史背景等三个方面谈起。

首先，本书选定“乡村社会”为研究范围，初源自本人浓厚的乡村情结，与本人是中国当下一位乡村贫苦农民的儿子有关。本人家居农村，世代力耕务农；家父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农民，朴实，勤勉，任劳任怨，经历了国民政府至今的各个历史时期，终年不辞劳苦，一辈子不知疲惫。然而终其一生父亲始终生活在贫穷的梦魇中，何也？本人成年后，在大学毕业回到农村工作的那时起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尽管离开了农村，在城市参加了工作，家里有了一点稳定的经济来源，却依然无法摆脱贫穷的困境。贫穷，依然贫穷！这是我家乃至家乡几十年来的基本事实，也是当代中国农民和农村中不容否认的基本现实（当然并非民国时期的乡村社会可相提并论）。正是骨子里固执的乡村情结，时时催促着自己从“贫穷的农村”这个现实出发，不断追问着以下问题：农民为什么穷？农村社会怎样才能摆脱贫穷面貌，真正走出一条现代化的发展之路？这不仅仅是现实中国最令人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曾经是一个历史思考的遗留问题。带着这些揪心的问题，我尝试着走近中国近代的乡村社会，力图探究乡村社会

变迁中具体的历史场景，揭开久藏心底的那个“贫谜”！

然而，摆在国人面前的现实是，帝制末期及结束后的近代中国，其社会转型承载着现代化进程及半殖民地化进程的双重困厄；乡村社会变迁更多地表现为危机的加剧和解脱危机的种种努力交错在一起；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问题，实际上已远远超越了问题本身。在急切探求乡村社会发展和中国现代化出路的过程中，出现了“所谓重农主义派、重工主义派、工农并重派；农村复兴派、都市建设派、乡村建设派；资本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民生主义派；放任主义派、统制经济派、合作运动派；交通建设派、生产建设派等等，各派均试图在自己的学理论证框架中，提出改造和建构中国发展的模式。”^①——尽管，历史早已证明，近代中国的种种现代化努力被迫陷入外部危机并处于半殖民地化困境中，难免失败的命运与结局，失败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失败的淡忘与忽视，尤其是面对失败中那些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缺乏必要的凝练与总结。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与变迁的辨正逻辑总是处于“变”与“不变”之中，在历史传承中延续并转型，由量变到质变；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如此，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更是如此。由此看来，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参与农村合作运动的人们及“乡村建设”派等始终致力于乡村社会现代化的种种艰苦的探索，均为求“变”；而这种探求至今“未变”，且还在不断努力中，即使放在今天，尤其对于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来说，似不无意义。

理清历史上近代农村合作运动的脉络，反观当今农村发展合作组织的历程，深藏脑海的疑虑不时浮现出来：近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是怎样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它在近代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到底取得了哪些成绩？留给后人哪些启示？在21世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将如何运用合作组织来整合农村，组织农民，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这些难言的忧思总是扣打出心底无尽的追问，促我，走进那充满遐思的知识境域，进一步思考。本人认为，在思考和探索有关当代农民脱贫及农村社会现代化问题的过程中，应立足于现在，着眼于未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古今中外已有的成果、资源及发展模式实属必然。因为“任何理论模式都

^① 王先明：《从〈东方杂志〉看近代乡村社会变迁——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的视角及其它》，《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第5页。

有其学理的价值，也有其现实试验的意义；尽管都有局限，且历史发展和演进最终都超越了模式本身，但历史所积累的认识价值却是永恒的。^①同时，回顾历史，将当代中国农民与农村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中去审视，或许更能够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认清其时代特征。这是时代赋予史学义不容辞的使命，也是史学回应并作用于社会的基本功能。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更作为一名生长在农村，对贫穷有着深切感受的农民之子，特别关注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命运，选择农村合作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作研究课题，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责任要求”，更是一种深藏心中的乡村情结使然。笔者欲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探索一条有助于当下农民脱贫致富、农村社会文明进步的可行之路。斯是所想，望有得焉！

其次，本选题与笔者就读的南开大学图书馆馆藏丰富的“合作运动”特色资料有关。“看米下锅，量体裁衣”；任何研究选题都是在有一定时间、资金和资料保障的前提条件下，方才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并最终确定、完成。因而，从最初的选题到最后定题，本书所研究的内容基本上是一个逐步跟进的过程。根据个人的旨趣，笔者最初以近代湖南的乡村社会为考察对象，初步将选题的方向定为“国民革命与乡村社会变迁”。导师王先明教授认可并给予了充分肯定。经过一段时间的文献检索和资料阅读后，我发现馆藏与上述选题的相关材料相当有限，特别是有关民国时期湖南乡村社会的地方材料实在太少（或限于个人所知），因学业时限，因此这一很有意义的选题显然不具备相应的可操作性，只好作罢！选题似乎因此遭遇“危机”。

在此后有些紧张的日子里，我坚持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翻检资料，意外发现图书馆特藏部藏有大量民国时期“合作运动”资料。图书管理员告诉我，这是南开馆藏的特色资料。我如获至宝，先前出现的“选题危机”似乎马上又有了“转机”。重新检索文献资料，了解相关研究动态，令人惊喜：相关文章不多，几乎还没有相关研究专著！惊喜之余，及时商与导师；导师给了我足够的宽容和理解，认为“合作运动”同样值得去大力挖掘和研究。这样，论文的换题就被欣然通过，“合作运动”作为大的研究方向基本确定。

① 王先明：《历史学视野下的“三农”问题——历史的沉积与现代趋向》，《光明日报》“治史心语”，2004年6月22日。

笔者最初以“民国时期合作运动研究”为题，作大范围的资料和文献阅读，感觉自己仿佛走进了迷宫：合作思想流派多歧；多元政权纷争下，合作政策有明显的差异性；合作动机或价值取向的多样化等交织在一起。于是，我感到一时很难把握，遂以“合作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民国时期合作运动研究”作题，欲在既定的框架内，就近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作整体研究。然而，难题并没有因此解决：中国农村合作运动整体研究依然包含着北洋政府、国共两党、日伪政权等不同时期难以统一的丰富内容。根据合作原理，“合作运动”研究应选择一个在正常社会经济条件下进行的对象，更有代表意义。民国时期的农村合作运动几乎贯穿了整个发展进程，而抗日战争时期及之后的内战均处于非常态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各区域发展又极不平衡，在没有进行充分翔实分段分区域的研究前，该课题的研究意义很难彰显。于是，在进一步思考及广泛收集材料后，笔者决定选择一有代表性区域，对不同时段在农村合作运动作纵向研究。最后还是现有材料说了算：天津是华北的重镇，南开大学图书馆馆藏的特色资料主要内容集中在华北地区，且大多为第一手原始资料。因此，选题最终确定以华北区域的农村合作运动为研究中心，重点放在今河北省和山东省，尤其是以定县、邹平这两个“乡村建设”中最具代表性的试（实）验县为考察对象。

当然，笔者最终确定以“华北区域”为研究个案，还有着更为深刻思考。首先要说明的是，近代华北区域的社会经济条件等历史背景相当特殊，几乎发生过“戏剧性变化”；诚如罗澍伟先生所言，“在近代社会，华北区域的经济变动与经济重组之剧烈，（中国）没有哪一个区域可以与之相比。”文中所指的华北区域，系指中国“黄河以北，东北地区以南，关中地区以东，黄、渤海以西的广大区域”，差不多囊括了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地区，其空间位置大致相对于今自然地理中的“华北大平原”；它“以河北（直隶）为核心，在综合自然地理、人文气候、风俗习惯等方面均表现出许多内部的均质性；在经济活动上基本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交流范围，具有一定的内聚性”；同时，还是一个行政设置较为特殊的管理区域。^①然而，研究者的“华北区域”所指也不尽相同，丛翰香先生“华北平原农村研究课题组”由于需要和行政区划联系，指明

^① 罗澍伟：《谈谈近代的“华北区域”》，见江沛、王先明主编《近代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之“名家笔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以冀鲁豫三省为研究范围^①；黄宗智探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主要以华北平原上的冀—鲁西北地区为对象，即以河北和山东为研究范围。^②本书所言的“华北区域”基本限定在今河北及山东两省；这不仅因为原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在本书简称为“华洋义赈会”）指导下的信用合作社，最初仅有河北的“一枝独秀”，而且在国民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合作运动，在华北地区也“以冀鲁二省为最发达”。^③

本书之所以最后选定以“20世纪20—30年代华北农村合作运动”为分析对象，除了上述的图书馆馆藏资料优势之外，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

第一，华北农村为近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的发源地，也是乡村建设运动团体开展合作实验的中心地区。整个20世纪20年代几乎就是华北（更具体说是河北）一枝独秀；具体由华洋义赈会负责指导实施，以组织德国雷发巽信用合作社为主要内容。20年代末期江浙地区由省政府指导的合作运动才刚刚起步，并主要仿照华洋义赈会的组社办法。30年代江浙合作运动大力推广之际，华北农村合作运动同时得到了较大发展；且华北地区有着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典型区域特征，因此，用区域方法来研究近代中国的农村合作运动，华北地区的合作运动似乎更具典型意义。

第二，华北合作运动以1930年《河北省合作社暂行条例》颁布为标志，前后可分为明显不同的两个阶段。前期以民间社团——华洋义赈会作单独指导，因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几乎都不注重合作运动，故缓慢发展；后期农村合作逐步由中央与地方政府主导，华洋义赈会、华北农业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各乡村建设团体、民众教育机关及银行等机构共同负责推进、指导，而定县和邹平两实验县的合作事业得益于乡村建设团体与地方政府的共同参与和指导，产生了更为有效的影响；1935年近代中国第一部《合作社法》的正式颁布与实施，则标志着农村合作运动已纳入到中国统一的合作行政体系之中，而华北农村合作运动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效，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一直成绩名列前茅。其中，农村合作运动似乎还存在三种性质与特征迥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发挥着各自特定的历史作用。因而，探求中国农村合作运动的经验教训，华北农村合作运动应更具

① 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4页。

②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背景篇”，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3页。

③ 方显庭：《中国之合作运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34年版，第6、14页。

有比较分析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从整个中国近代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进程来看，似乎只有华北农村合作运动保持了一个较长时间且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1923—1937），其发展经验较为成熟，成效也最大，已为学界所公认，应有更多值得总结和借鉴的经验或相对完善的措施。其他地区的合作运动（包括江浙）往往还处于非成熟发展阶段，就被非常态的侵略战争肆意打断。可以说，华北农村合作运动对于探索经济社会相对稳定发展时期的中国乡村建设，更具有借鉴意义。

近代中国“风云突变”，处在了天灾人祸、内外交逼、农村金融枯竭、经济破产、农村社会面临崩溃等严峻情势下；在此种种“农村问题”频发之际，农村合作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有其具体的现实目的和制度安排在，如华洋义赈会最初的指导思想是“合作防灾”，大多民间社团的旗帜都可归结为“乡村建设”，南京国民政府提倡的口号是“救济农村、恢复经济”或“挽救农村、复兴经济”等，也有其他的政治、军事用意，但最终表现出的是农村合作社的经济社会功能。很显然，农村合作运动就是为了“治贫”“救穷”或“造产”，用当前的话语就是“发展经济”。因此，这场经济运动一经实施，对中国乡村社会产生诸如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卫生等全方位、多层次的作用和影响，甚至其社会意义还超出了其经济意义。

笔者认为，不管对近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的实际效果如何评估，其在本质意义上应为一场促使乡村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变革，是一次农村社会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有益尝试，华北农村合作运动更是开启了这种尝试的先例。就华北农村合作运动来说，唯其动力虽不是自发于纯粹的乡村社会内部，而是由华洋义赈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等民间社团以及各级政府组织等各种外力引导或推动的，因而这种社会变革或可称为一种“关联变迁”或者“计划变迁”（罗吉斯语，详后“第四节”）；同时，由于各民间社团具有更容易为传统乡村社会所接纳的倾向，也采取了更适合乡村内部的变迁步骤，因而其变革模式又可称为“选择关联变迁”，而非纯粹的“计划变迁”。这种区分或正体现了华北农村合作运动的独特之处及其历史认知价值。虽然，当代乡村社会的“三农”问题与历史上的同类现象如农民负担过重、农村发展滞后等，其“表现形式不同，时代特征有别”；然而，透过种种现象可以看到贯穿中国近现代乃至当代的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乡村的衰败或不发展已经成为制约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因素。这